

10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从文言到白话 从繁体到简体
——近代转型期中国的书面语和文字

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叙录

洛夫“天涯美学”的诗学意义

现代文学馆中的当代文学史料

鲁迅翻译研究
——从“直译”和“重译”谈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关键词批评”发展检视

《魔鬼家书》与书信体写作模式：被置换的文学义素和错接题材形式

中文学术前沿

第十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文学术前沿

第十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文学术前沿. 第10辑 /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308-15475-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6958 号

中文学术前沿(第十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责任校对 胡 畔 唐妙琴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320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475-8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词汇通史”开题论证会召开



2014年12月22日上午9点至11点半，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词汇通史”开题论证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行政楼229会议室顺利召开。论证会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何文炯教授主持，参加论证会的专家组成员有北京大学蒋绍愚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江蓝生教授、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徐时仪教授，项目首席专家方一新教授、课题组成员黄树先教授、王云路教授、汪维辉教授、史文磊副教授和王诚博士。

首席专家方一新教授作开题汇报。他介绍了国内外有关本课题所涉主题和内容研究状况的学术史，对已有相关代表性成果及观点做出了科学、客观、切实的分析评价。并且介绍了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框架以及预期目标。本课题将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结合训诂学、文献学等知识，充分吸收既有研究的成果，对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1. 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2. 同源词和孳生词；3. 同义词和反义词；4. 成语、谚语和典故；5. 借词和译词；6. 意义和词的关系；7. 词义的演变；8. 构词法；9. 社会发展和词汇发展的关系；10. 汉语词汇对周边语言的影响。



论证专家组江蓝生研究员、吴振武教授。



论证专家组蒋绍愚教授、徐时仪教授、王宁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开题论证会召开



2015年1月17日上午,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启真酒店顺利召开。出席会议的论证专家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陈尚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研究员刘跃进,长江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长江学者、武汉大学教授尚永亮。子课题负责人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浙江大学王德华教授以及课题组核心成员等20余人参加了会议。《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徐枫、浙江古籍出版社文科编辑室主任陈小林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何文炯教授主持,浙江省社科规划办俞晓光主任应邀出席并发表了讲话。

课题组首席专家胡可先教授代表课题组先作了开题汇报。胡可先教授

重点汇报了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情况、研究意义与总体框架,同时也简要叙述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创新之处、预期目标、课题组架构和经费预算等多方面的内容,对项目的总体情况作了全面规范、详略得当的汇报。而后,与会专家围绕开题报告提出了许多较具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尚永亮教授高度评价了该选题的学术意义以及课题组成员的研究实力,认为课题的进一步展开需要重视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和理论概括三合一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如将研究方案的步骤进行细化,经费上申请滚动资金支持等。钱志熙教授认为出土文献自身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拥有极大的文化史价值,因此本课题围绕着考古发现进行研究是极具科学性和可行性的。他建议在项目的展开过程中,将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展到诗学、词赋、文体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廖可斌教授对课题组前期的充分准备颇为赞赏,并强调课题组在文史结合的基础上加强图文结合互证。刘跃进教授则强调在重视考古发现的同时,建议侧重写本、抄本时代的考古文献研究。陈尚君教授认为,在目前的学术界,出土文献的历史学研究已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文学研究则略显薄弱,在出土文献的文本阐述方面也仍有待挖掘,因此“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和前沿性。他建议课题组在专题研究上不断深入,开拓视野,进行文学本位、社会学、艺术史、宗教史、家族文学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他还提醒课题组出土文献的材料日新月异、十分丰富,应尽量避免前人已做过的成果。(撰稿人:虞越溪、胡凌燕)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学 术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骧 严家炎 吴元迈 吴熊和 裘锡圭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德华 方一新 池昌海 孙敏强 苏宏斌

李咏吟 吴 笛 吴秀明 汪维辉 张德明

周明初 胡可先 姚晓雷 徐 岱 徐 亮

黄 健 黄 擎 黄笑山 盘 剑 楼含松

主 编:汪维辉

副 主 编:吴 笛 黄笑山 胡可先

本辑执行主编:吴 笛

目 录

语言文字学研究

从文言到白话 从繁体到简体

- 近代转型期中国的书面语和文字 汪维辉(1)
- 论“参”的音变构词 余 忠(12)
- 谢铎近体诗用韵研究 廖秋华(17)

古典文学研究

- 新出土唐代诗人墓志叙录 胡可先 杨 琼(41)
- 重塑隐士:早期传记作家对陶渊明的建构 (美)田 菱(69)
- 香草美人传统的新变
——论李商隐诗、温庭筠词中闺怨作品的意义 吕正惠(82)

批评视角

- 洛夫“天涯美学”的诗学意义 吴 晓(94)
- 语义与诗意 (美)肯尼思·伯克(100)

当代文学研究

- 现代文学馆中的当代文学史料 王 芳 吴秀明(112)
- 当代文学的焦虑关注与历史期待 王学海(127)

经典译介与传播

鲁迅翻译研究

- 从“直译”和“重译”谈起 李思龙(136)

关键词批评

-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关键词批评”发展检视 孟 瑞(144)

- “关键词批评”对中国文学研究与文论转向的理论启示 杨 艳(154)
- “关键词批评”生成发展的文化语境 叶沈俏(162)

域外视野

- 《魔鬼家书》与书信体写作模式:被置换的文学义素和错接题材形式 孙鹏程(170)
- 布莱克诗画与象征主义 应宜文(175)

序跋书评

-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新版前言 飞 白(181)
-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公器理念与文献整理模式
——兼述哈燕图书馆馆藏善本明清别集总集的收藏与出版 徐永明 乐 怡(191)

从文言到白话 从繁体到简体

——近代转型期中国的书面语和文字

汪维辉

内容提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国难日深。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成为救国图强的必由之路,而文言和汉字难学难写,成了普及文化的两大障碍。于是“国语运动”就自然地兴起了。广义的“国语运动”包括三个目标:1. 改革汉字;2. 统一国语;3. 推行白话文。三者互相联系。1917—1919年间,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合流,声势浩大,彻底动摇了文言文作为正规书面语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话被确立为汉语标准语。从此以北京话为标准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汉语的正式书面语。汉字改革有两条路线:一是创制拼音符号,从“切音字”“简字”到“注音字母”,再到“国语罗马字”,最终定型于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之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二是汉字简化,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在汉字历史上开辟了一个“简化字时代”,简化字成为中国大陆的法定文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语文革新,汉语书面语从文言变为白话,文字从繁体变为简体,并且采用罗马字母作为注音符号,这是历史的必然。有人提出要恢复繁体字,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主张是注定行不通的。汉字是否要改成拼音文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这个问题需要继续观察和研究。

关键词:文言;白话;拼音文字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中国的语言文字经历了历史巨变,概而言之就是两句话:书面语从文言变成了白话,通用的文字从繁体变成了简体。

一、从文言到白话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难日深。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自尊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意识。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首先必须开启民智,让普通民众能识字读书,但文言和汉字难学难写,成了普及文化的两大障碍。于是“国语运动”就自然地兴起了。

广义的“国语运动”包括三个目标:1. 改革汉字;2. 统一国语;3. 推行白话文。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1. 改革汉字

早在宋朝,就有一个叫邓肃的人说过:“外国之巧,在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故迟。”^①明末的方以智(字密之,1611—1671)主张中国应该“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见《通

^① 参看吕叔湘:《语文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04页。

雅》)。清初的刘献廷(字继庄,1648—1695)撰《新韵谱》,已经论及统一国语、研究方言、制造音字三要义,^①梁启超说他“最足以豪于我学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二曰倡新文学”(见《清代学术概论》)。这些先知先觉者都认识到了汉字的弱点。

光绪十八年(1892),被黎锦熙称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懋章,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他在序中说: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其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着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92页)

这代表了当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汉字改革的看法。

汉字改革有两条路线:一是创制拼音符号,从最初的“切音字”(卢懋章等)、“简字”(王照、劳乃宣等),到后来的“注音字母”(章太炎等,后改称“注音符号”),再到“国语罗马字”(刘复、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林语堂等,所谓“数人会”。简称“国罗”,缩写为 G. R.),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的《汉语拼音方案》;二是汉字简化。这些留待下面第二部分再详述。

2. 统一国语

国语统一运动大家劳乃宣在 20 世纪初提倡“简字”,他把简字运动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步是“方言统四”(京、宁、苏、闽广),第二步才是“国语统一”。劳氏所论并非没有道理,但他所设想的从“方言统四”再到“国语统一”的方案实际上是难以实行的。

1900 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在天津出版,他的“官话”是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此后经过 20 多年的论战(甚至于打架),如“京国之争”(指国音和京音的差异如何取舍^②)、声调问题(所谓“国音京调”)等等,统一国语问题才逐渐达成共识。1926 年 1 月,《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中说:

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论理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京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第 16 页)

以北京话为全国标准语,至此基本确定下来。到 1956 年 2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取得法定“国语”的地位,标志着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最终确立。

3. 推行白话文

“白话文”也叫“语体文”,是跟“文言文”相对而言的。早在 1868 年黄遵宪就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口号;维新派人士、创办《无锡白话报》的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1898 年)一文中提出

① 见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国语周刊》1932 年,第 32—34 期。

② 其实国音和京音相差极有限(约为 5%)。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 153 页。

“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白话文成为运动则始于民国六七年间(1917—1918)的新文学运动初期。

1917年,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杂志,首先提倡“文学革命”,第一篇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二卷五号),第二篇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二卷六号),第三篇是刘复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三卷三号)。但这3篇都是文言文,其他白话作品也还很少。到了1918年,《新青年》完全用白话做文章了,胡适于4月间做了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国语。”这篇文章发表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北京的《晨报》和《每周评论》,都是这年12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组织与《新青年》互相应和的《新潮》,是次年1月出版的,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都打扮着正式登场了。1919年,国语研究会的会员增加至九千八百余人。于是国语研究会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运动和《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完全合作了,这是要大书特书的一件事。黎锦熙说:

这年4月间,巴黎和会中我国外交失败的噩耗传来,“五四运动”突起,“六·三事件”发生,全国人心激昂,罢课罢市,风声鹤唳,《每周评论》式的白话小报,突然发生至四百余种之多。日报的附张,大都取消了旧式滥调的诗文或优伶娼妓的消息,改登新文艺和国语的译著;有名的几种副刊,如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以及北京《晨报》副刊等,都是从那时候逐渐改良,逐渐增刊的。教育界改国文为国语的要求,居然压倒千余年来科举的余威,使行政机关毫无犹豫地办到了!(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136—137页)

“新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合流后,出现了一些崭新的气象: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1920年12月24日,教育部公布《国音字典》^①;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紧跟着教育部的训令和通告,1920年一批小学国语教科书出版了:国民学校用《新语体国语教科书》八册(商务印书馆),《新法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新教育国语读本》(中华书局),等等。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四册,也在那一年出版了。1923年6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刊布其所拟订的《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其关于国语的要点有:(1)小学及初中、高中,一律定名为“国语科”;(2)小学读本,取材以“儿童文学”(包含文学化的实用教材)为主;(3)初中读本,第一年语体约占3/4,第二年为2/4,第三年为1/4;(4)高中“目的”之第三项为“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5)《略读书目举例》,初中首列《西游记》《三国演义》,高中首列《水浒传》《儒林外史》《镜花缘》。这个纲要虽没有经过教育部公布,但教育界试行一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组织法》的时候。于是教科书大为改观。

推行白话文与统一国语是紧密相关的。最初的白话文多为模仿之作,黎锦熙说:

这种白话,是已经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已经产生了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这些“活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一声呐喊,全国的学士大夫,自然而然都“不学而能”地写得出从没写过的“白话文”来。(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第14页)

后来的白话文才逐渐转变为以北京口语为基础,像赵元任《“连书”什么“词类”》这篇文章(见

^① 1932年5月,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方才代替此书。

《国语周刊》一二〇期):

反对拼音文字的人,他们顶爱问的问题就是同音字怎么分别的法子。这问题的顶容易答的答复就是“词类连书”:只要是成词的字都给它们拼的一块儿。每个词就有它各自各儿的“面孔”,就不会跟别的词混了。

这个法子当然是不错。可是我觉得要是一个人单靠这个法子,他写起文章来还是会用些声音不干脆、字眼儿生冷的词类来咛兹咛兹的(ngtzyvxde)写了一大片,我怕结果还是不像从活语言里写出来的活文字,还怕像是一种汉字的文章,不过换个样儿罢了。

要把 G. R. 文字写得明白,好说,又好认,我觉得还得有几样儿事情应该格外留心的。

第一要紧的话是:别怕写白话。现在不是白话文已经通行的日子了吗? 国语罗马字不是本来单为写白话文用的吗? 还说什么怕不怕的话呢? 我所以还要说这种废话,是因为现在一般的白话文靠着有汉字的鬼脸儿,还可以不管说得明白不明白,只要汉字“写”的明白就算了。拿这种文字改拼成了罗马字,哪怕是里头的词类都没有跟别的词同音的,还是没有真正拼音文字的味儿。真正白话的好处待哪儿呐? 就是因为曾经有过这么些人用了它这么些年代,凡是听了不容易明白的词,早就丢了不用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虽然用不着说非用顶白的白话不可,但是至少可以说,写拼音文字的时候儿,咱们得要拿顶白的白话来做个标准。

上头说的是咱们应该走的大概的方向。分开来说呐,就有底下的几样得留心的事情:

一,声音要响亮。凡是希虚希虚乌里乌里声音的字总是少用的好:juhyih(注意)不如 li-oushin(留心);yush(于是)不如 ranhow(然后);iouluh(忧虑)不如 fachour(发愁);lihshyr(立时)不如 maashanq(马上);lihje(立着)不如 jannje(站着);buderyii(不得已)不如 meifal(没法儿);shyyjong shiuyaw chiuh de(始终须要去的)不如 tzaowal deei yaw tzoou de(早晚儿得要走的)。

二,多用同音字少的字:shiu(须)不如 deei(得);tzyh(自)不如 tsorng(从);ing(应)不如 gai(该)或是 inggai(应该);chyuan(全)不如 dou(都);jyh(制)不如 tzaw(造)。

三,在文法上“l”(儿)韵当名词的记号儿的,应该放开了胆儿多用用。wey 有 weysherme(为什么)的 wey(为),鼻子闻的 wey(味);well 就一定是闻的 well(味儿)了。suey 有 pohsuey(破碎)的 suey(碎),niansuey(年岁的 suey(岁),挂的 sueytz(穗子)的 suey(穗);suell 就一定是挂的 suell(穗儿)了。daw 有 dawluh(道路)的 daw(道),dawnall(到那儿)的 daw(到);dawl 就一定是 tzooudawl(走道儿)的 dawl(道儿)了。yi 的意思多得简直让这个字音没法儿单用,yel 就一定是母亲姐妹的那个 yel(姨儿)了。wan 有 wanle(完了)的 wan(完),wanshoa(玩耍)的 wan(顽),yawwantz(药丸子)的 wan(丸);wal(玩儿)就一定是小孩子 wal 玩意儿的 wal 了。

四,一个字有几种读法而意思没有分别的,就用跟别的字同音顶少的那个读法。she(色)不如 shae,bor(白)不如 bair,bor(薄)不如 baur,jwo(着)不如 jaur,jyue(嚼)不如 jyau,luh(六)不如 liow。

五,单字词够明白的就不用改成生冷的两三字词,shiee(写)不必改 shushiee(书写),wal(顽儿)不必改 wanshoa(玩耍),benn(笨)不必改 yubenn(愚笨),tzoong(总)不必用 tzoongguei(总归),shiudeei(须得)也可以就用 deei(得)。

六,要是用多音字词的时候儿,顶好里头的那些单字也都是声音响亮意思明白的字,因为中国的白话的词类虽然有慢慢儿变成两字词的神气,但是老实话说,到底还有一半儿是用单字词的;并且哪怕就是用多字词的时候儿,里头所用的单字的意思还是在说话人的脑子里头

活着呐,并不像英法文的多字词里头的拉丁字的本来的意思都是半死半活的了。所以假如你用些很文的文言,同音字又很多的字,拼拼凑凑弄出一大些词来,像 jifwu(羁缚),jingbor(精博),youluann(淆乱),fuuwew(抚慰),yuhniann(欲念),jigow(机构),shyhtay(事态或世态)什么的,看的人假如看不出来是什么汉字,就很难看懂;假如“因为猜出了汉字来”才懂的,那还不是仍旧让汉字在背后跟 G, R. 唱双簧? 我的 G, R. 朋友里头,有人对我说,那些词就是得那么硬学,不用管它本来是些什么汉字。这个“做”是当然没什么“做”不到,碰到了新思想用老“普罗”的白话没法儿说的时候儿,那也只好造点儿汉字的双簧词儿来用用,预备以后有唱“单簧”的日子。不过我现在要说明白的,就是万不可因为靠有汉字帮你造词,弄得你以后(换个比方说)断不了汉字的奶。所以要造多字词的时候儿,假如能用声音响亮、意思明白的单字作材料,那还是该用这类的单字,哪怕你拼出来之后另外有新的讲法,可是给学的人可以容易学得很多,用它跟读它的人的嘴里也可以多尝到些滋味儿。他们老先生们喜欢咬文嚼字,可是关着嘴唇儿偷偷儿的咬人家的汉文嚼人家的汉字,那就有点儿太寒碜了。

……我写这篇东西是一起头儿就拿 G, R. 打草稿的,这么写法写出来才是真正的 G, R. 的白话文。我敢说要是先写了汉字再翻成罗马字拼音,那结果恐怕不是那么回事了。以后你们写稿子的时候儿也这么来看看!(按:这篇原稿是用国语罗马字打的,这里是翻成汉字。)(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第 75—78 页)

这种完全属于“我手写我口”的地道白话文虽然并没有成为主流,但是以活的口语为基础来写白话文的精神却是逐步被大家接受了。

二、从繁体到简体

在“国语运动”中,文字改革是最先被提上议事日程的。黎锦熙把文字改革归纳为三种主张:

把“大众语”写在纸上而传达于“大众”眼前的工具就是文字。……“大众语文”工具的好坏,就只看训练的难易——所需时间的长短,用力的多寡,效率的大小。说到这里,便是很严重的汉字问题了。就“大众语文”这一点上说,汉字当然不是好工具,是坏工具,四十年来,经过种种的比较研究,大家目击身验,铁案如山,不必再论。不过汉字现在在中国还是唯一的擅有权威的工具,这是事实问题。四十年来,热心“大众语文”的人,都想把这种工具由坏的改成好的,约有三种主张:一是汉字改良,主张尽量采定“简体字”,至今还在研究讨论中。一是汉字改换,主张注音,终于制定了一套“注音符号”,“注国音可,注土音可,注于文字之旁可,单用而注出口中之语亦可”。(语见民国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国民政府训令,看末一句,可知是“汉字改换”也)三是汉字改革,主张另造一种拼音文字,终于制定了一套“国语罗马字”。(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第 18 页)

所谓“汉字改换”,黎锦熙是这么说的:

“汉字改换”的政策,就是想把注音符号弄成日本的假名一样,使它先附在汉字旁,逐渐而自然地掺入汉字中,终于不会汉字的也自然能读写“大众语文”了。这个观念,只需到过日本一趟的,想想他们的市街,他们劳动界下女们早上读报的情形,便会“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的。往年王照、劳乃宣两先生的观念实在也是这样。(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第 32 页)

关于“国语罗马字”能否作为文字替代汉字,黎锦熙说:“国语罗马字究竟要到何时才能通行?这个早有答复:‘100 年也可以。’”(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第 40 页)这是指黎锦熙发表在《国语罗马字周刊》上的国汉对照短文《一百年也可以》:

Ibae nian yee keeyii

Yeou ren wenn woo;Gwoyeu Romatzyh dwotzan
keeyii tongshyng? Woo shuo; ruguoo daytih
Hanntzyh, tzoongdeei wuubae-nian how, Jehsh ige
liisheangde jong-shuh, inwey Yiguu shiansheng
yiiwei jyy yaw ibae-nian, erl Wu Jyhhuei
shiansheng tserngjing shuo yaw ichian-nian.
Ibae-nian yee keeyii, tzay shao ideal
yee keeyii, jiow kann woomende nuulih; nuulih
bian shu, chu baw, fanyih sanchian-nian lai de
jiowjih, fanyih shyhjeh de mingjuh; chupiin
yueh duo, tongshyng yueh kuay, tsyyway bye wu miaw-faa.
Jearu bu nuulih ne? Wuubae-nian how,
Jonggwo yee yaw gaeyonq pin-in wentzyh de,
nah sh tzyhran erl ran, rutorng jea-guu
jong-diing wen mannxde bianncherng
shiannshyngde kaeshu, shyngshu, tsaoshu,
pohtiitzyh iyanq. Buguoh bijeau nah “yeou
yihshyh de” gaeger, yaw nonq de
luannchibatzau ideal.
Shyhjian ichieh dou sh shann biann de, ige
mintzwu de yeuyan wentzyh youchyi shann biann,
nii bu yaw te biann, te yee biann, jehsh dah yuantzer.
Ren jy suooyii keeguey jee, jiow tzay jydow
moou-shyh yaw niann, jiow yushian jiashanq ideal
“yeou yihshyh de” biann. “Ibae-nian yee keeyii”,
jeh jiawtzuoh “shian tian erl tian fwu wei”;
“wuubae-nian how, Jonggwo yee yaw gaeyonq
pin-in wentzyh de”, jeh jiawtzuoh “how tian
erl fenq tian-shyr” (dou sh Yihjing liitou de huah).

一百年也可以

有人问我：国语罗马字多咱
可以通行？我说：“如果代替
汉字，总得五百年后。这是一个
理想的中数，因为疑古先生
以为只要一百年，而吴稚晖
先生曾经说要一千年。”
一百年也可以，再少一点儿
也可以，就看我们的努力；努力
编书，出报，翻译三千年来的
旧籍，翻译世界的名著，出品
越多，通行越快。此外别无妙法。
假如不努力呢？五百年后，
中国也要改用拼音文字的，
那是自然而然，如同甲骨
钟鼎文慢慢地变成
现行的楷书、行书、草书、
破体字一样，不过比较那“有
意识的”改革，要弄得
乱七八糟一点儿。
世间一切都是善变的，一个
民族的语言文字，尤其善变，
你不要它变，它也变，这是大原则。
人之所以可贵者，就在知道
某事要变，就预先加上一点儿
“有意识的”变。“一百年也可以”，
这叫作“先天而天弗违”；
“五百年后，中国也要改用
拼音文字的”，这叫作“后天
而奉天时”。（都是《易经》里头的話）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213—215页）

这就是当时以及后来许多语言学家所坚信的一条“真理”：中国的文字一定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今天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仍然难以下定论。

下面重点说说简体字。

从上面所论可以看出，文字拼音化（包括民族化的注音字母和国际化的国语罗马字）是一个遥远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于是第一种主张——汉字改良（即简化）——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1909年，陆费逵就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认为笔画简单的“俗体字”易习易记，“用于普通教育，事顺而易行”，“有利无害，不惟省学者之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较便也”。1921年，他又发表了《整理汉字的意见》一文，认为：“我们要

减少难学难写的困难,只有赶快整理汉字。整理方法有两种:一,限定通俗字的范围;二,减少笔画。”1920年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上,钱玄同发表了《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在1922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钱玄同又正式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现行的汉字,笔画太多,书写费时,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为学术上、教育上之大障碍。……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方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外面有些人反对这减省汉字笔画的办法,有的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有的说汉字是“衍形文字”;既是“象形”或“衍形”,则古人造字,字形之中具有精意,不能随便将它减省。这种议论是没有道理的。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我们应该谋现在的适用不适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第19页)

同年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1930年刘复、李家瑞根据12种材料,收录了近两千个俗字,编辑出版了《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影响很大。

钱玄同于1934年又提出了《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理由】今后写汉字,应该力求笔画减省,以便赴速急就,这是本会在十年前议决要办的事。近几年来,社会上注意这问题者渐多,最著者如陈光垚氏之创造“简字”,卓定谋氏之提倡“章草”,容庚氏之采用古今笔画减省的字体写印他的专著《颂斋吉金图录》等等皆是。办平民教育的人,也有将通行的“俗体字”附入于平民的读物之中的。案简体字的应用,决不仅限于平民教育;正式的小学中学内,尤应尽力提倡,庶能渐渐普及于全社会,得到写汉字的大便利。但要普及简体字,先要规定简体字的写法;要规定简体字的写法,先要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做材料。有了这种材料,便可就其中选取最适用之一体定为标准的简体字;有了标准体,便可用其偏旁而为新的配合。这一配合,简体字便多多的增加了。要是还嫌不够,便可参考这些固有的材料所用减省笔画的方法而造新的简体字。所以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是规定简体字的预备。固有的简体字,其可取材者约有六处:(一)现在通行的俗体字;(二)宋元以来小说等书中俗字;(三)章草;(四)行书与今草;(五)《说文》中笔画简少的异体;(六)碑碣上的别字。

【办法】拟就上列六类中,搜采较适用之简体字,编为《简体字谱》一书。(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282—283页)

钱玄同亲自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于1935年8月正式公布。当时选采简体字有三项原则:“(一)依述而不作之原则;(二)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三)原字笔画甚简者,不再求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语言文字工作。1955年中央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确定了当时文字改革的3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一文对简化字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摘引如下:

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在汉字历史上,开辟了一个“简化字时代”。

这个方案包含515个简化字和45个简化偏旁;1964年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1986年重新发表),总共包含2235个简化字。这些简化字在中国大陆已经普遍推行。新学文字的学习简化字,原已识字的自学简化字,中国大陆的识字人口没有不识简化字的。

从1956年到1988年,中国大陆的小小学毕业生逐年增加,从一年大约400万人增加到一年大约2000万人,共计毕业四亿七千多万人。扫盲结业学员平均每年大约600万人,共计结业一亿五千多万人。二者合计六亿二千多万人。他们学习的都是简化字。

从1956年到1987年,中国大陆出版的图书,包括新书和再版书,大约45万种,累计印数大约700多亿册;出版杂志从一年大约400多种增加到一年大约5000多种,累计印数大约200多亿册;出版报纸从一年大约100种增加到一年大约800种,累计印数大约2000多亿份。这些出版物都是用简化字排印的。此外,有少量用繁体字排印的书报,例如给国外华侨看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一些文史古籍。

总的来说,中国大陆已经进入“简化字时代”,时期长达1/3的世纪。

小学教师们说:简化字有“三好”,即“好教”、“好学”、“好写”。

.....

可是,“三好”不是绝对的。有些简化字比繁体字难教、难认、难写。例如,简化的“长”字、“尧”字,比繁体的“長”字、“堯”字,教起来更麻烦,写起来更困难。又如“纤”字既读xiān(纤维,繁体纖),又读qiān(拉纤,繁体綯);“干”字既读gān(干杯,繁体乾),又读gàn(干线,繁体幹);一字多用,一字多读,易发生错误。这些缺点是“草书楷化”和“同音代替”等方法用得不得当所产生。少数简化字简得不合适,不能否定多数简化字的良好作用。“瑕不掩瑜”。当然,这些由于简化而产生的问题以及原有汉字中的同类问题,应当研究解决。

简化字所以顺利推行,主要由于采取了“约定俗成”的原则,也就是遵从群众的习惯,顺水推舟,事半功倍。515个简化字中间,有324个(63%)是1956年以前早已存在的“手头字”(包括古本字、古同字、古通用字、约定俗成字等),使用了几百年、甚至千年以上。另外一些简化字是草书楷化或同音代替所形成,简繁之间大都有形体和读音的联系。“简化”主要是把“俗体”改为“正体”。(大陆简化字跟1935年南京公布的以“述而不作”为原则的“第一批简体字表”324个简体字相比,完全相同的有225字,大同小异的80字,不同的19字。)

“约定俗成”的原则很重要。1977年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所以遭到了反对,终于取消,主要由于它违反了“约定俗成”原则。

有人说,汉字简化使原来识字的人变成了“文盲”。这是夸大。.....

有人说,汉字简化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把“文字”和“文化”混为一谈。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也有人说过,白话文破坏了传统文化,那是把“文体”和“文化”混为一谈。这类误解是经常发生的。春秋时期的《论语》、《孟子》等书,原来是用篆文抄写的,汉代以后改为隶书和楷书,字体大变,字形大简,无人说汉代破坏了传统文化。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同“隶变”相比,只是小小的变化,怎么会破坏传统文化呢?相反,以现代字体重印古书、以现代语言解释古文,才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有效方法。

汉字简化的好处是明显的,但是,汉字简化的好处是有限的,不宜夸大。不能认为汉字简化了,扫盲工作就非常容易了,因为文盲的存在还有其他复杂的社会原因。台湾没有简化汉字,可是台湾的扫盲工作做得很好。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可见繁体字比简体字好学好用。这同样是逻辑混乱。

汉字简化有副作用:旧书新书不同、海内外不同。从国内外整个汉字流通地区来看,旧的“书同文”破坏了,新的“书同文”还没有建立起来。

.....

现在,国内用简化字,新加坡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也大都用简化字。中国台湾用繁体字;

香港也用繁体字,可是香港书店里简化字书籍也不少。使用简化字的总人口估计有六万万;使用繁体字的总人口估计有三千万(20:1)。汉字如果重新建立“书同文”,将同于简化字呢,同于繁体字呢,还是折中于简繁之间呢?改变少数人使之同于多数人呢,改变多数人使之同于少数人呢,还是“各行其是、简繁由之”,以观后效呢?

台湾发表《标准行书范本》,共收4010个常用字,其中有简体字大约1580多个(40%),包括跟大陆简化字完全相同的约640多个,基本相同的约400多个,另有约400多个是大陆还没有简化的。(计算标准不同,数目可能有出入。)*“台湾”的“台”(繁体臺)在台湾报纸上多数场合写成“台”。可见台湾也不是绝对不能用一个简化字的。

台湾以“繁体”为“正体”,以“简体”为“俗体”;学字要学“繁体”,写字可以写“简体”,这就是所谓“识繁写简”。其实,这是“识繁也识简”,因为不可能“写简”而不“识简”。

大陆推行的识字方法是:以“简化字”为“正体”、以“繁体”为“旧体”。小学生只学“简体”、不学“繁体”。中学以上学生,可以根据需要,学习或多或少的繁体字。大陆的经验是:识字由简而繁、由易而难、由少而多、由今而古,是利多而弊少的渐进方法。

“删繁就简”是人类一切文字的共同发展趋势。使用汉字的东亚国家,近100年以来,都逐步减少通用字数、简化汉字笔画,这是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前进运动。

三、语文革新:历史的必然

在近代转换期,汉语书面语从文言转向以北京话为标准语的白话,文字从繁体转向简体,并且采用罗马字母作为注音符号,这些都是历史的必然。

1. 从文言到白话

汉语的正规书面语历来采用文言^①,但是汉代以后,口语与书面语逐渐脱节,大概六朝以后,言文差距越来越大,终至于完全分离。读书人模仿先秦经典所写的文言文,普通民众是看不懂的。于是大概从唐代开始就有白话作品出现,如王梵志的白话诗、敦煌俗文学作品、禅宗语录等,后来发展为宋儒语录、话本及拟话本小说、评话、诸宫调、元曲、明清白话小说等等,可谓源远流长。

随着国门打开,西方文明涌入,国民觉醒,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得以勃兴。据不完全统计,自1897年至1911年,完全以白话为文体的报刊至少有130多种,而且还不包括一些文白夹杂的报刊。白话遂蔚为大观,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一经“新文学运动”号召,白话文很快就推广开来。

在封建时代,白话文基本上只在民间通行,不登大雅之堂。不过早在元明时代,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官方文件甚至皇帝的诏令,也已经有用白话写成的,例如《元史·泰定帝纪》所载泰定帝即位诏(中华书局点校本):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刺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士

^① 这是概而言之,实际情况相当复杂,这里不细论。